

山海识东坡

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



编者按

1月31日，“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——苏轼主题文物展”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。为应和本次文物展，本期椰风版特别邀请了几位知名作家、学者，

从不同的角度讲述苏东坡从出生、入学、参加科举及至贬谪儋州的一些生活片段，让我们得以接近趋于真实的东坡先生。

科举史的华彩章

孔见

嘉祐二年(1057年)的科考，堪称中国科举史上最华彩的一页。之所以如此，全因为欧阳修担任了主考官。是年正月六日，欧阳修受命知礼部贡举事，仁宗皇帝特别赐予他“文儒”的尊号。同知贡举的还有翰林学士王珪、龙图阁直学士梅挚、知制诰韩绛、集贤殿修撰范镇。欧阳修文学上的同道梅尧臣作为参详官，参与试卷的审阅。一群人随即进入贡院，开始五十多天的封闭，直至二月底出闱之后才能够出来。

北宋开国以来，文坛流行追求辞藻华丽、形式雅致的文体，这种文体因《西昆酬唱集》得名，被称为“西昆体”。代表性诗人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，都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人士，他们推崇晚唐李商隐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，讲究修辞的精美和格律的工整，却忽略直指世道人心的精神内涵，渐渐形成了一种套路化的写作。庆历年间，欧阳修的同年进士、执掌太学教席的石介，大肆抨击“西昆体”，称其“穷妍极态，缀风月，弄花草，淫巧侈词，浮华纂组”。在他的矫枉之下，太学生们好新奇，又形成一种扭捏造作、佶屈聱牙、奇崛怪诞的文风，被称为“太学生”，属于学院派的路数。欧阳修曾经致信石介，批评其“好异以取高”的文学倾向，指出“君子之于学，是而已，不闻为异也”。但这位自许甚高的老友并不以为然。欧阳修将“西昆”“太学”两种文体视为左道，决意通过科考来破除陈腐积弊，扫荡文坛的风气，赓续韩愈发端的古文运动和文以载道的传统，继往开来，完成一场文体上的革命。为此，他明确要求应试作文必须言之有物，平易自然，凡为险怪艰涩之文者一律黜落！

太学生中有位名叫刘几的，被认为是国子第一，特别喜欢使用生僻怪诞的词汇，在这届考生中呼声甚高。欧阳修在试卷中读到一篇作文，结尾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天地轧，万物茁，圣人发。”尽管是名字已经糊住，但他断定必是刘几的卷子无疑，于是拎了出来，并在上面批上“大抵谬”三个字，将其张贴在墙上，作为反面教材让考官们观摩。

这一届策论的题目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在众多考卷中，有一份策论让梅尧臣大为惊喜。此论言简意赅，而且思路清明，态度中和，将仁治天下的理念阐述得十分周全。其中有这样精辟的字句：“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。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赏以爵禄，是赏之道，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，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，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，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，故曰忠厚之至也。”

参详官连忙呈送给主考。欧阳修法眼一扫，便觉得此文思路绵密，见地独到，行文沉稳，名列榜首不容商量，但脑筋一转，怀疑此文极有可能出自学生曾巩之手。此次评卷标准改变，已经招来舆论的喧哗，如果获得魁首的是主考官门下弟子，将会授人以柄，引火烧身。于是，他将卷子降为策论的第二名。揭榜之后才知道，却是眉山苏洵儿子苏轼的答卷，而此子十八岁的弟弟苏辙，也榜上有名。

原先，殿试都会有一些考生落榜。有的来自边远地区的落榜者，因为缺少返回家乡的盘缠，流离失所，甚至有人跳河自尽。仁宗皇帝听说之后，内心恻然，便在殿试环节取消“黜落制”，所有礼部上报的进士，全都通过皇帝的御试。也正是因此，欧阳修的理念得到了畅通的贯彻。因为评价观念的扭转，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士子得以鱼跃龙门，成为国家的精神财富。北宋中后期的精英人物，大都出自这一届科考的龙虎榜。文学方面有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；思想方面有程颢、张载、朱光庭等；政治方面有章惇、吕惠卿、曾布、王韶、吕大钧等。这些人可以说是欧阳修的门生。在考场上遭遇重挫的太学生刘几，之后不仅转变文风，也将名字改为刘焯，重新参加两年之后的考试，被时任殿试详定官的欧阳修擢拔为状元。欧阳修之后以被公认为一代文宗，不仅因为他的文学成就，还在于他襟怀量度开阔，慧眼识人，见得别人的好，由衷地为他们欢呼鼓舞，没有文人相轻的恶习。

考试结果公布，三百八十八名进士，得到了皇帝亲手赠送的《儒行篇》。那是《孔子家语》中关于儒者品德与行状的叙述，君子人格的集中体现，士子修身的指南。

本届科考，苏轼成绩居中，以乙科上榜，但策论单科成绩突出。这次成功的应试，不仅为他今后的人生铺垫了阶梯，也让他结识了程颢、张载、章惇、曾巩等一批国家的精英，并从此与他们发生命运的交易。张榜之后，他照例分别致书各位考官，感谢他们的知遇。看了苏轼的《谢欧阳内翰启》，和随函附上的文章，欧阳修对梅尧臣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！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。”回到家里，还对儿子说：“汝记吾言，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！”他真的是要把文坛领袖的地位，出让给初出茅庐的苏轼了。不过，在这场科考中慨叹至深的，莫过于苏洵，他百感交集地说道：“莫道登科易，老夫如登天。莫道登科难，小儿如拾芥。”实在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对他而言如同登天一般的难事，到了两个儿子这里，怎么就像在地上捡起一根草那么容易呢！

北宋仁宗景祐三年(1036年)十二月初九的早晨，大地看起来同往常一样辽阔而安静。中国西南部的眉山百姓，却发现了一件令他们惊讶的事情。眉山位于嘉州(乐山)以北四十多里一处山水形胜之地，尤其是那条环绕小城的岷江支流玻璃江，清澈见底，宛如一湾明净的流动玻璃。眉山人家一早推开门窗，看见熟悉的彭老山(彭祖山)的西边，一片云蒸霞蔚的景象。

就在这一天的卯时，眉山苏家诞生了一位男婴，姓苏名轼字子瞻。苏家系出上古黄帝与嫫祖之孙高阳颛顼大帝。到了后汉，苏章的子孙一直居住于赵郡(河北邯郸)。唐代武则天时期，诗人苏味道官眉州刺史，迁益州刺史，还没有来得及到任，即病死于眉山途中。苏味道之子只好留在眉州，这是苏家在眉山生活最直接的远祖。苏家程夫人望着襁褓中的婴儿，这个苏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(长子已夭折)，生得虎头虎脑的，心中有说不尽的喜悦。忽然想起刚刚怀上时，自己做的那个奇怪的异象之梦：一位眇着一只眼睛的瘦和尚来到苏家，希望在家中暂住一夜。

苏轼很早就知道母亲这个梦。苏轼说：他在七八岁时也做过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是一个和尚，在陕右一带行化布施。

苏轼曾经问过父亲苏洵，为什么要给他们兄弟俩取个都带车旁旁的名字。苏洵说：你叫苏轼，这个轼，和车轮、车辐、车盖和车轸等相比，在车子的结构中并不算重要的，只是车前的一截搭手的横木，但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如果车子没有轼，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子了，是不是？苏轼有点儿不高兴了，噘着小嘴儿问道：我就那么没有用处么？苏洵爱怜地抚摸着苏轼的脑袋：你当然有用，正因为你太有用了，所以，才专门为你取了这个名字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：要像那段不起眼儿的木头一样，放低自己，不显山露水，不锋芒毕露。你呀，苏洵屈指右手食指，轻轻敲了一下苏轼发亮的额头：你呀，虽然年纪还小，我已看出很多头苗头来，别砸着了路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佝偻的身影走到树下乘凉。几个孩子觉得有些扫兴，跑到别的地方玩儿去了。只有苏轼留下来，他认识这个九十岁的朱姓老人，就住在城边的一座尼姑庵中。老尼给苏轼讲了个故事：你知道成都吗？那是七八十年前的旧事了，那时候啊，咱们这儿还不叫大宋呢，叫孟蜀，咱们的皇帝叫孟昶。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

就不是车子本身的任何结构，而它的重要性，却几乎超过了车子本身，为什么呢？苏轼想了想：我知道了，天下的车子，都是沿着前车之辙而前行的，所谓前车之鉴嘛，看来，子由弟弟很厉害呀。苏辙安静地坐在一旁，始终不发一言。多年以后，历经苦难的苏轼早已身为苏父，才渐渐明白父亲当年的苦心，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
一转眼，苏轼就七岁了，在程夫人的引导下开始识字读书。孩子生性浪漫贪玩儿，苏轼也不例外，读一会儿书就闪人。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在纱影行的附近不远处，苏轼正和弟弟子由、程之元还有陈太初几位小朋友一起玩儿爬树摘果子比赛的游戏。几个孩子像淘气的猴子一样将摘下的梨子和板栗直接扔下树下来，一个两个三个地数着，看谁扔得最多。忽然听见有人叫道：小心，别砸着了路人。正在这时，一个佝偻的身影走到树下乘凉。几个孩子觉得有些扫兴，跑到别的地方玩儿去了。只有苏轼留下来，他认识这个九十岁的朱姓老人，就住在城边的一座尼姑庵中。老尼给苏轼讲了个故事：你知道成都吗？那是七八十年前的旧事了，那时候啊，咱们这儿还不叫大宋呢，叫孟蜀，咱们的皇帝叫孟昶。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

眉山生三苏

向以鲜



《东坡咏春图》刘运良作

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后，在儋州城南的桃榔林里买下一块荒地要结庐而居。乡民、当地读书人、莘莘学子一齐动手，只需几天便盖起了三间草房。他命其名为“桃榔庵”。他给朋友写信说：“初至儋官屋数椽，反复遭追逐。不免买地结茅，仅免露处。而囊为一空。困厄之中，何所不有？置之不足道，聊为一笑而已。”

苏东坡一笑，笑出了随遇而安的超然心态：既然自己不属于朝廷，不属于官场，那就属于民间；此处村舍连环，鸡犬相闻，弥漫着人间烟火，太好了。何况，桃榔林周边都是箭竹，“竹树疏疏影”，“涩笋暗啖村”。他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

在百姓中的苏东坡出入有热情的问候，又有亲切的关照。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米月无”时，当地的朋友就拿米来，乡亲们也送来红薯、芋头、野菜，夜里躺在床上听见嘈杂的猎鹿声，早晨就有猎人叩开他的柴门，以鹿肉相赠。桃榔庵里很热闹，当地的读书人来讲学，外地和本地的学子来求教，黎民百姓也来做客。人们喜欢听这个学识渊博的人谈天说地，讲新鲜的事，讲有趣的故事，或者和他谈笑逗乐。他经常和农民在桃榔林里席地而坐，天南地北地聊。他讲一阵，就轮到别人讲。农民讲不出，他就让他们讲人的故事。苏告诉人们，若有一天没客人来，他

桃榔庵的乡音

李焕才

父亲就像身体不舒服。苏东坡也写信给苏辙说：“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在我眼中，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。”

桃榔庵里常听到山歌，苏东坡学着唱。一天在田野里，农民送给他一个大西瓜，他头上顶着那西瓜踩在田埂上，边走边高兴地哼着山歌。一位老太婆送饭给地里的丈夫，见他调皮，像个小孩子，问：翰林大人，你现在和我们一个样，想来，是不是像一场春梦？他哈

家出了，曾跟着师傅去蜀宫做些法事。苏轼望着神采奕奕的老尼，突然觉得面前的老人像一个穿越时空的神灵一样。老尼接着说：也是在一个夏天，比今天热多了，是黄昏吧，也可能刚刚入夜，我看见蜀国皇帝和他最喜欢的花蕊夫人一起，坐在皇家园林摩河池边纳凉呢，那场景太梦幻了，令我终生难忘。皇帝和夫人一边赏月，一边吟咏着诗词。苏轼好奇地问：老人家，你还记得他们吟的什么诗词吗？老人不无自豪地说，我还记得其中一首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——苏轼一边听着老尼的吟诵，一边想象着成都摩河池的壮丽景色。说也奇怪，一种难以名状的清凉之美，迅速传遍苏轼的全身。这个故事给孩提时代的苏轼印象十分深刻，以至于四十年后，苏轼谪居黄州时，仍然对此念念不忘。可惜已经不记得老尼背下的全词，只有头两句记忆犹新。于是，在这两句的基础上，苏轼写出了《洞仙歌》。是啊，流年总是暗中偷换，而讲述蜀宫旧事的老尼，早已不在人间。

八岁时，苏轼正式入读小学。说来凑巧，苏轼就读的学校就在天庆观北极院中，负责教学的老师，是张易简老道士。在上百个学生中，张道士最喜欢这个叫苏轼的学生，从苏轼身上，他看见了神奇的未来景象。一天，有个从京师汴梁回来的读书人，带来了《庆历圣德诗》，和张道士一起欣赏。苏轼从旁边经过，看见两人津津乐道的样子，有点儿好奇，想悄悄上前窥观一下，看到底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苏轼仅仅是从旁边瞥了几眼，居然就背诵出来了。苏轼问道：先生，请问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人，是些什么厉害的角色啊？张道士说：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呢！苏轼眉头一扬，不服气地反问道：他们是天人吗，如果是天人，那我不敢知道了。如果不是天人，而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那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知道呢！张道士听完苏轼的话，觉得小小的苏轼句句在理，并且有一股倔劲儿和豪气，连连拍案叫奇。张道士还耐心地给苏轼讲那十一人原委——告诉给苏轼：子瞻，你要知道，这里面个个都是大人物，尤其是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和欧阳修四人，堪称当世人杰啊！从此，土杰的种子，就在苏轼幼小的灵魂中落土生根了。四人之中，除范仲淹苏轼没有见过，其余三人后来苏轼均有交往，欧阳修还成了苏轼终生不忘的伯乐和恩师。

任意浩无边

远人

十月秋高气爽。此时苏轼，正值意气风发之时。青春本就是意气的另一种说法，何况今番入京，将是仕途的全面打开，四下看去，只觉天宽地阔，似乎无处不能任己翱翔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舟上行进的，都是自己至亲至爱之人。两年在京师，父子三人不都是被公认的才子吗？对苏轼来说，只觉得前途如眼前江流般开阔。想起前人李白写过的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诗句，豪迈固然豪迈，却终究是失意时的自我暗示。所谓暗示，也就是未能实现的愿望不肯消散，能不能最后实现，终还是未知之数。今天的自己却完全可以实现连李白也未能实现的理想。他不需要暗示自己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，眼前不正是乘风破浪的时刻吗？

大河滚滚，舟行如箭。从眉州南行两天后，至一百二十里外的第一站嘉州(今四川省乐山市)系舟上岸。因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于乐山交汇，商贸游人自是不少，历代名胜也多，最为天下扬名的便是建于唐朝的乐山大佛，其头、身、足三部，分别由乌尤山、凌云山和龟城山三山联襟而成。一行人游兴大起，登凌云山观大佛，游龙岩和凌云寺。从后世徽宗年间邵博笔下“天下山水之观在蜀，蜀之胜曰嘉州，州之胜在凌云寺，寺之南山，又其胜也。嘉祐中，东坡字其亭曰清音，又南山之胜也”的句子可见，当日苏轼在游寺之时，除了题诗，还兴致勃勃地将寺内能“俯江干，平视三峨，极旷望之致”的亭子题名为“清音亭”。这也是有史可考的苏轼第一次为亭题名。

理所当然是，出门所遇，不仅事，还有人。苏洵曾负笈八方，识人甚多，此刻想起嘉州相识，便携二子出城十里，拜见隐居于此的老友程公望。程公望住在九顶山南麓，该处有三洞，洞名颇富道家色彩，分别为“白云”“朝霞”“清风”，合称“白崖三洞”。程公望居于“朝霞洞”中，专心致志地注解《易经》。也因此，后人又将其称为“治易洞”。能遇奇人异事，苏轼自大为振奋，更何况，他幼年的开蒙之师张易简便是道士。此时苏轼对道学和《易经》虽还谈不上有多深研究，却也并非完全陌生，与程公望畅谈甚欢。

返城后已到黄昏，在渡口见一大汉瘦马傍身，端坐江边远望，神情漠然。苏氏父子虽是文人，却性格豪迈，觉其颇有异人之姿，遂上前攀谈。得知对方名叫郭纶，是嘉州一个监税小官。交谈中知郭纶自幼习武，尤以弓箭见长，曾投军河西，在与西夏交战中，固守三川寨立下战功，却未见多少封赏，后在黎州(今四川省汉源县)做过一段时间都监官，因无钱不能归乡，遂流落嘉州栖身。世间不平事从来随处可见，对苏轼来说，还是初次听闻，感慨之下，动笔为郭纶写下以“河西猛士无人识，日暮津亭阅过船”为起句的诗歌相赠，苏辙也为其赠诗，令郭纶大起知己之感。

旅途间的逢人遇事，都是眼界得以开阔之举。当一行人于十三日登舟，继续南行时，苏轼对嘉州几日见闻感慨倍生，又交织起对前途的展望。舟行不久，一首《初发嘉州》的诗歌在兄弟二人笔下同时涌出。苏辙的有三十六行，苏轼的虽只十二行，却令人更为过目难忘：

朝发鼓闻闻，西风猎画旂。
故乡飘已远，任意浩无边。
锦水细不见，蛮江清更鲜。
奔腾过佛脚，旷荡造平川。
野市有禅客，台台寻暮烟。
相期定先到，久立水潺潺。

将这首诗与苏轼后期诗歌相比，说不上老辣，却自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之气。说其不老辣，不等于说它不成熟。今天重温该诗，能发现苏轼的创作风格在起步之时，跟不像李白那样以想象取胜，也不像杜甫那样以忧患为先，而是以自己情感对事物的垂直挖掘为重心。能挖到多深，取决于才力和最后的思想深度。对二十出头的苏轼来说，当然还不会知道，自己踏上这条创作之路，将等同于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人生到不了极处，这种写作也到不了极处，二者相辅相成。

舟往南行，嘉州远去了。岷江宽阔，水远云高。在故乡待得太久的人，都会渴望故乡外的天空。离开眉州的苏轼，还需一些时日，才能离开四川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